

Peking 北京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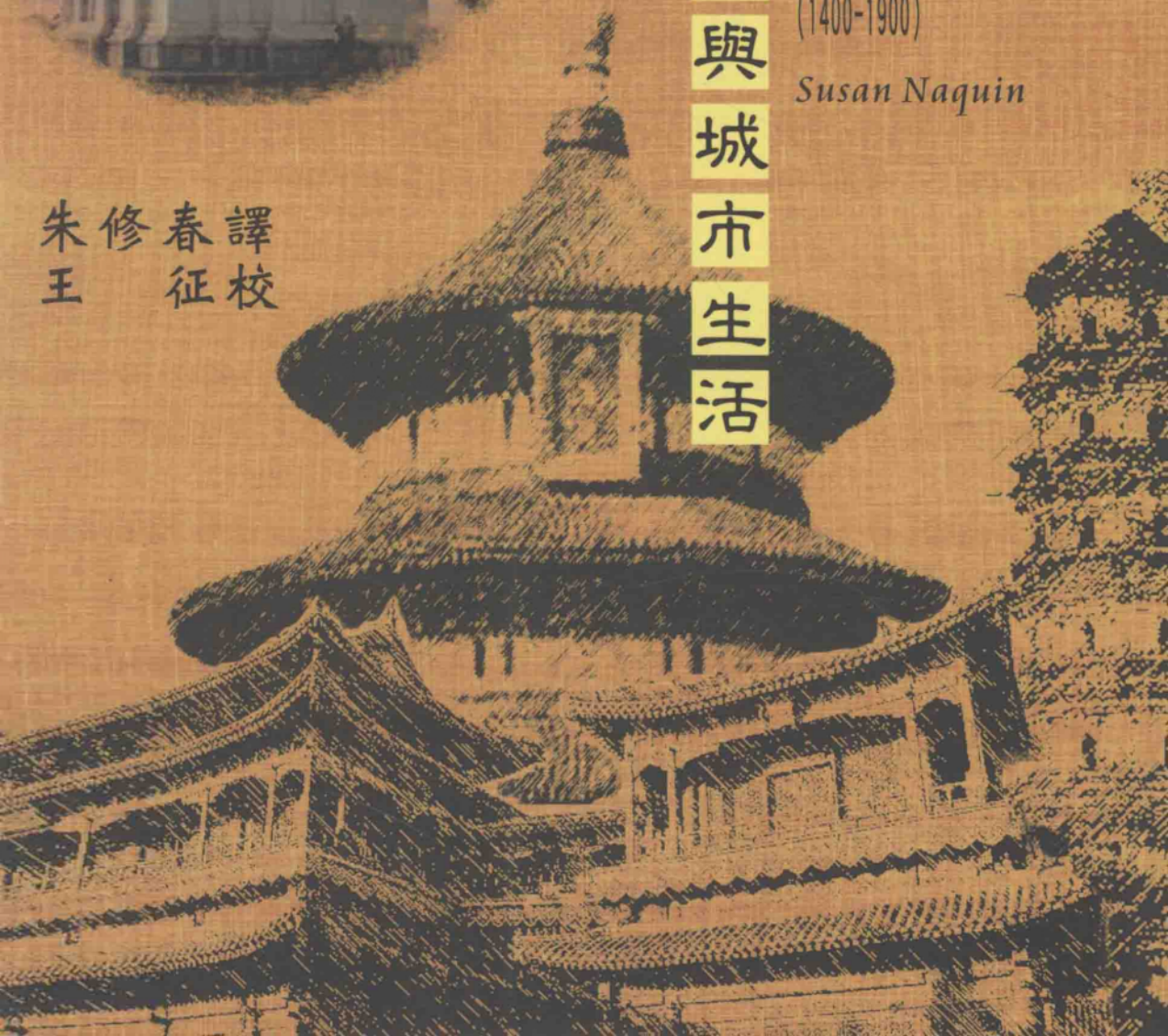
寺廟與城市生活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Susan Naquin

譯校 春征
修王 朱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Susan Naquin

北京

寺廟與城市生活

(上)

(一四〇〇—一九〇〇)

韓書瑞◎原著

朱修春◎譯

王 征◎校

本書獲得 2013 年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研究項目「近代中國的圖像：20 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學者的詮釋趨向」的資助（項目編號：13RWZD02）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 / 韓書瑞(Susan Naquin)

原著；朱修春譯。-- 初版。-- 新北市：稻鄉，2014.01

冊；公分

譯自：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ISBN 978-986-6078-38-5(全套：平裝)

1. 人文地理 2. 北京市

671.094

102028102

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上）

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

原著者：韓書瑞（Susan Naquin）

譯者：朱修春

校者：王征

文字編輯：黃麗梅

封面設計：石舜華

印行：稻鄉出版社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53巷28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http://dawshiang.myweb.hinet.net>

印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800元（全套二冊不分售）

初版：2014年1月

I S B N：978-986-6078-38-5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譯本序

巫仁恕*

本書的作者韓書瑞教授 (Susan Naquin) 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韓教授成名已久，早期的研究以民間教派的叛亂運動為主，¹她在處理這類課題時已經注意到由城鄉不同的角度來作探討²；之後與羅斯基 (Evelyn Sakakida Rawski) 合撰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史的專書中，提到文化生活 (cultural life) 時也以城市生活 (city life) 作開端，可見其很早就注意到城市的重要性。³接著她將研究的焦點轉移到北京的民間信仰與進香活動，⁴部份成果已融入本書中。筆者所見關於本書的英文書評相當多，⁵相對地中文書評或書介卻很少見。⁶筆者不揣己力，願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² Susan Naquin, "The Transmission of White Lotus Sec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55-291.

³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5-63.

⁴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⁵ 關於本書的英文書評，參見以下的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1(2002): 167-16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2(2003): 597-599; *The Historian* 66. 3(Fall. 2004): 607;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2. 3(2002): 510-512; *Asian Affairs* 33. 2 (June. 2002): 291-29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0. 4(Dec. 2002): 922-925;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8. 2(2001): 478-483;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82. 2 (April. 2002): 26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盡力介紹之以饗讀者。

本書的主旨與結構

在序言中作者提到本書的三大主旨，一是希望透過北京來看宗教的動力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一是挑戰過去認為明、清二代是連續的假說；一是強調中國社會在近代早期（early-modern）所出現的新發展，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新的機制和動員習慣，延續與影響到二十世紀的現代。接著交待了本書的史料來源，較特殊的是作者提到清代刑科題本與碑刻史料也包含了許多有關城市生活史的資料。另外，作者也指出本書並不是要涉入九〇年代西方學界流行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爭論，也不是要回答中國是否能走向民主化的問題，而是在指出中國歷史發展中可能出現社會公眾的自主性（social activism），並且主張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宗教方面。

⁷ 作者指出過去的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的缺點，如過去宗教史的研究太偏重教派、教義與思想，而人類學的共同體理論則無分城鄉，所以作者想另闢蹊徑，從城市寺廟來看共同體與地域認同的形成。

全書除導論與跋文之外共計十六章，以下略述各章主旨。第一章介紹北京城牆、水道等硬體設施，並指出城市的界線。第二章介紹北京內的神祇與僧道等神職人員。第三章大致介紹了北京寺廟的贊助者、資產、管制，並且大略介紹以寺廟為中心的公共活動。第四章描述明代北京城創建的歷史。第五章談到明代宮廷所建的廟壇。第六章討論明代前期北京城內的各類社群與其認同問題。第七章是論及晚明以後北京的變化。第八章描寫北京的風景名勝與寺廟的

62. 1(2002): 218-230.

⁶ 本文係根據筆者先前所撰之書評增修而成，原書評刊登於《明代研究通訊》第六期（2003年12月），頁121-128。

⁷ 雖然如此，但是作者仍花了一些篇幅討論明清城市為何沒有出現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作者認為一則是人口過密與土地利用上的緊張使得不可能保留有太多隙地，一則是政府不鼓勵公共聚眾集會；所以寺廟以合法的宗教活動提供公共聚集的場所，成了建立共同體與定義認同活動的中心。

地位。第九章敘述明清之際朝代轉換過程中，北京城內社會結構的變化。第十章描述清政府對北京城的管制政策。在第十二章作者討論清據中國百年後北京城內旗、民之融合過程。第十三章描述清代北京的景觀。第十四章討論北京的宗教社團，主要是集中在東嶽大帝與碧霞元君信仰有關的社團。第十五章談及私人目的創建的宗教場所，如家廟、清真寺、教堂、喇嘛寺、齋堂、會館與行會等等。第十六章中作者討論北京寺廟的公共功能，包括市場、娛樂、救濟、慈善與政治等功能。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作者所謂的「寺廟」(temples)是泛指各種宗教的聚所或機構，並非狹義的佛道寺廟。作者蒐集到了明清北京約二千五百餘所的寺廟史料，她在第二章中談到寺廟建築時，就認為大部份看似大同小異，連清真寺的外表亦與其它寺廟相類似，而且佛道的神祇也可以同處一廟。其次，關於北京城的範圍，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城牆並不是城市的界線，北京城市生活的參與者尚包括了城郊鄉村的村民。正是因為作者採取這樣寬廣的視角，使得本書不會拘泥於一些宗教信仰的細節與差異，也不再以城牆來定義城市生活的範圍。

城市認同的形成

本書最重要、也是最精采的部份是作者透過對宗教信仰活動的分析，來討論明清北京的內城與外城、城內與城外、上下階層與不同種族的居民逐漸融合一體，形成城市認同的過程。明代前期從官方的行政角度出發，並無意創造一個地域共同體之認同。所以北京從整體來看，城內的各類社群仍是各自並列而未完全融合，而此時的宗教機構的功能之一就是為各類社群區分界線與加強排外性。比如說作為同鄉會館的寺廟主要是士商作為交際的場所，所以此時期的會館仍是私人場所，而非公共場所。(第六章)約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北京寺廟重要的發展是僧道的角色漸漸變淡，而世俗化的傾向漸濃。新興的集體祀神活動也在此時興起，最重要的就是東嶽大帝的「聖會」與碧霞元君的「香會」。以神明出遊形式為主的東嶽聖會活動，將神明的生日變成節日，且延長至月餘，成了城市公共的認同；後者的香會則是各地信徒帶神像到娘娘廟進香的活動。兩者都是自發而獨立於政府的直接贊助之外，而且是吸引士大夫與文人加入的

跨階級活動。事實上對北京各階層居民而言，碧霞元君已成為地方的驕傲。作者認為寺廟雖離西方所謂的public sphere還有段距離，但確是公共而非私人的空間。（第七章）在第八章末尾作者對明代北京城下一結論，她認為在1600年的北京已發展成熟為具有強烈文化特色與認同的城市。寺廟則在每一個北京居民的認同觀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提供了一個多元社群組成與表達自我的發源地。

易代的連續或斷裂

本書的另一主旨是探討北京在明、清二代是否是連續或斷裂的問題。作者在第九章敘述明清之際朝代轉換過程中，北京城內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形成內城旗人、外城漢人分住的狀態。作者強調過去學者認為明清是連續的觀念，放在北京的城市生活來看是錯的。

清代北京變遷的情形在本書的十二、十四章中有詳細的討論。清初的北京在清廷統治下，有意地採取隔離政策。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開始出現變化，而促成改變的動力就是宗教活動。作者在第十二章中根據潘榮陞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所撰之《帝京歲時紀勝》一書所載，再與明代的歲時節令相比較後，發現除了家庭內的節令（如新年、清明、冬至）之外，變化最多的是與神祇、寺廟有關的節慶，不但有許多新的神明誕辰加入，而且是在許多新的地點舉行。在其記載中雖仍可見內、外城之間的旗、民之別（如城隍神節慶儀式在內、外城就有不同），但是從潘氏的許多論述都顯示他已設想了一個共享的北京文化，因為他只強調士、庶之分以及本地人和外地遊人之別。而他所描述在公共空間所舉行的許多活動中，又以寺廟的宗教活動與儀式最為重要。因而作者認為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為止，北京外來的各類移民已經逐漸成為在地人，原來隔離政策下的不同社群也漸漸趨向融和為一體，進而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與完整性（integrity）。接著在第十四章作者又以晚明興起、清代盛行的妙峰山「香會」為例，指出明代的神會到清代進一步發展成進香的活動，甚至演變成團體旅遊的活動。再者，十九世紀初的碑刻史料顯示內城與西北郊的旗人是進香活動的重要成員，也是最主動的贊助者，這正象徵著旗人已融入了北京文化。

寺廟的公共功能及其演變

至於在導論中所提到的寺廟在近代早期的發展與影響方面，作者除了在三章中大致介紹了以寺廟為中心的公共活動，如演劇、市場、慈善救濟、士大夫講會、外人投宿、節慶與進香等，以及寺廟所具有的藏書、出版、藝術與休閒旅遊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在第十六章中的討論。作者認為以寺廟為中心的公共活動有助於北京建構共享的城市文化，如對北京重要的市集——廟市的了解，成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區別。越到近代，寺廟的公共功能出現許多變化。北京廟市範圍的擴大反映了商業化的傾向漸及內城，但是買賣的場所卻漸漸由傳統的廟市轉向現代的商店。至於娛樂方面，寺廟原有的演戲風氣隨著商業化的娛樂場所，如戲館、酒館、煙館（十九世紀興起的）、妓院漸增，寺廟所具有的娛樂功能逐漸弱化。

在救濟方面，政府往往就地取材地利用寺廟作為粥廠，同時將原有民間在寺廟中創辦的普濟堂、功德林、育嬰堂改為官督民辦。有趣的是政府並沒有建置新的行政衙署作為基地，而是仍利用寺廟。而且官府對民間救濟的曖昧態度，使得私人機構並不發達。直到十九世紀私人舉辦的局、善堂的功能才漸漸彰顯。而這些局與善堂在慈善活動的功能性與持續性，也遠遠超過寺廟。

政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紀時北京已經出現批評時政的詩社組織。特別的是松筠菴，它成了士大夫聚會論事之所，尤其是1890年代康、梁的維新運動即是在該處聚集知識份子成立改革團體。不過寺廟畢竟無法進一步形成更有效、更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因為這個場合是公開的，而且參與成員的歧異性太大。以上所論及的寺廟公共功能到了十九世紀以後，都已漸漸轉移到由新興的機制所取代。

統治階級的參與

本書中也不時地提醒讀者，統治階層對寺廟與宗教活動的影響力頗大。如明代宮廷的成員漸漸地透過建設寺廟作為中介，參與了北京的城市生活，舉凡皇室、宦官與宮中的婦女等等都曾是寺廟的贊助者。（第五章）清代的皇帝較

明代皇帝對寺廟的建造更為主動，而且透過各種管道涉入與改變內城與西北郊，相反地在這方面清代宦官的參與卻不如明代。（第十章）至於政府對民間舉行的宗教活動所採取的政策，也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清代皇權對香會採取的是兩面手法，一面鼓勵，一面禁止，其鬆緊的程度端視當時皇帝的態度以及社會治安的情況。官府尤其禁止跨省際的進香以及婦女進香活動，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多有信奉者，官衙廳署內甚至也有神壇，就連滿漢京官中都有倡議與贊助者。（十四章）再如清代少數民族和外來的宗教，多是在政府允許和保護下，如清真寺、天主教堂和喇嘛寺。然而一旦失去了政府的支持，生存也會成為問題，如耶穌會的天主教堂因十八世紀清廷的禁教而日趨沒落，基督教派僅剩俄國人的東正教堂存留於北京。原來清政府非常支持的喇嘛寺，到十九世紀清廷無暇他顧時也只得自謀財路。相反地，會館與行會因為在1860年代以前與政府一直保持著距離，所以自我的認同與生存上不受影響。（十五章）

地景與歷史記憶

本書還採取了一個新的研究取向，就從地景（landscape）與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探討明清北京文化的形成與認同。明清北京的風景名勝中，無論城郊或城內寺廟都佔有一席之地。饒富趣味的是作者特別花了許多篇幅，在探討外國人如日本、朝鮮、西洋人對北京的看法，尤其是西洋人的觀點。直到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北京城的佈局圖才為西方人所知；而皇城被稱為Forbidden City一詞，更是要晚到1880年代以後才被普遍使用。1880到1890年之間開始有真正的西方有閒精英自行到中國旅遊，並寫下許多記錄。對北京街道的一致觀點是骯髒、擁擠和貧窮。西方人對中國的寺廟也很有興趣，包括孔廟、清真寺等。但西洋人認為最值得旅遊的地方是天壇和市場。外國人的觀點也不見得一成不變，如日本人對北京的印象自明治維新以後就有變化。再者，東、西方的觀點也不同，如朝鮮人重視的是「北京八景」，西方人則只對蘆溝橋的獅子有興趣。在當時雖有不少外國遊人，但北京並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所受西洋文化之影響也遠不如上海之大。（十三章）

此外，雖然本書的作者並不希望太過注意各個宗教信仰與活動的差異性，

但是她在第十五章談及私人所創建的宗教場所，如家廟、清真寺、教堂、喇嘛寺、齋堂、會館與行會等等時，也注意到了不同宗教社團的特殊性。如就宗教團體的反叛性格而言，教門的齋堂最易成為反政府的場所。回教的清真寺也是回教徒的政治活動中心，因為清政府允許其相對較多的自治，使得回教徒的政治組織在規模上遠較中國寺廟為大，這也使得清真寺具有組織反抗的活力。關於他們與北京地方文化的融合方面，回教徒和鄰居的關係最為緊張，如光緒十一年（1885）中元節時北京就發生了回民暴動。相對地，喇嘛則擺脫了清初政府將其與市民隔離的政策，漸漸與北京漢人文化融合。⁸至於同鄉會館與行會成員雖然是具有地域色彩，但他們仍會選擇性地接受北京的地方文化；而且這些外來者也是北京的消費者與慈善家，所以認同北京不一定會是個問題。

西方學術脈絡下的異視角

以上是針對全書的重點所作的介紹。入門的讀者也許會好奇本書的作者為何在敘述明清北京的城市生活時，要刻意地探討城市認同、城市共同體等問題。其實作者的問題意識可以從西方學術界的兩大脈絡來理解，其一是西方關於中國城市史研究的脈絡。西方研究中國城市史一直受到韋伯（Max Weber）理論的影響，韋伯認為中國的城市並未具備符合西方城市共同體的標準，也未發展成自治城市，最大的障礙是來自皇權主導，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以軍事功能為主。⁹這樣的論調曾經長期影響西方學者對中國城市史的看法，直到羅威廉（William T. Rowe）所著的漢口史專書出版，這樣的論調開始受到挑戰。¹⁰

⁸ 作者指出在內城的葬禮遊行隊伍中，喇嘛的出現成為北京重要的景觀之一。

⁹ 韋伯著，康樂編譯，《經濟與歷史：韋伯選集（IV）》（臺北：遠流出版，1990），頁214-217；266-267。

¹⁰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我們可以將比較本書與羅威廉的著作，二者的主旨都是探討城市共同體與城市認同的形成，羅氏以商業巨鎮為例，韓氏則以首都城市為研究對象，但是很明顯地兩書呈現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與研究取向。羅威廉的研究取向較偏向比較，也就是將中國城市史的發展放在中西比較的脈絡中，如此一來較容易凸顯中國城市的特殊性。而韓氏明顯地聲明她不好此道，而寧願將這樣的工作留給其他學者。因此本書是採取較為「傳統」的作法，以平實無華的敘述來呈現，也因此讓讀者看到的是更為全面的圖像。筆者還要指出的是過去學者關於城市史的研究，很少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作探討，而這本書提供了城市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的新典範。這也提醒我們在從事研究城市史時，再也不能輕忽宗教信仰的力量。

其次，韓氏此書的論點和近年來西方學界盛行的「新清史」研究，在論調上迥然不同。近年來美國漢學界有些學者的研究一反過去如何炳棣與Mary Wright的「漢化說」（sinicization），像是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認為旗人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開始更積極地發展他們的民族意識。¹¹歐立德（Mark Elliot）也強調即使在幾個世紀以後旗人已忘了他們的母語，可是他們仍然保有征服者精英階層那與外隔離的自我認同。¹²上述這些學者多傾向滿、漢之間仍存在著認同的差異，韓氏在本書中雖然並沒有直接指涉滿人「漢化」的情形，而是從北京的城市認同的形成來描繪旗人與漢逐漸融合一體的過程，由是我們閱畢全書後會覺得她似乎仍是傾向「漢化說」。也許旗人與漢人的界線已經不再是語言、信仰與生活的差異，而是觀念上的自我認同。那道隔離旗人與漢人的有形城牆可以被打破，但是在心中所築起的這道無形的牆卻很難被催毀。旗人與漢人是否走向融合？旗人的漢化到什麼程度？在北京旗人與漢人融合的情況會是特例嗎？這些問題恐怕一時都無法有完整的答案，仍期待來者的努力。

¹¹ 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²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除了上述簡短的介紹外，本書內容所涉及的面向非常廣泛，許多議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例如作者主張宗教活動有助於城市社群的結合，但是這類活動的另一面可能是顛覆與暴力。筆者在江南地區的廟會節慶中，就發現有顛覆上下階級的活動與社區競賽的暴力行為，而這類的活動提供民眾從事叛亂與抗爭的象徵性資源。在明末清初所發生的許多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事件，常看到民眾藉著民間信仰活動的象徵儀式，一方面有強化抗議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想將他們種種的抗爭行動合法化。但並不是所有的廟會節慶活動，就必然地會導致集體抗爭或暴動；當然也不是任何一種神祇及其廟會節慶都會直接地成為人們集體抗爭的工具。¹³ 相對江南的廟會節慶活動，作為國家象徵的北京所舉行的東嶽聖會或碧霞元君的香會，其實都在官方嚴密的監控之下，而且民間也順從國家信仰。¹⁴ 所以很難看到上述那種顛覆與暴力的行為，這一點可能反映了華北城市的廟會節慶與華南的差異性。

以筆者所知，韓教授近年來關注於華北城市的廟宇研究，尤其聚焦於廟宇的物質文化，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視角。她也是美國學界第一位開設明清物質文化專題課程的教授，在這方面她帶動了一股新的研究風潮。日前筆者與韓教授通信後得知今年她已正式從教職退休，但仍在普大從事研究工作。這本中譯本在此時出版，正好是絕佳的紀念禮。感謝朱教授在翻譯上的貢獻，讓中文讀者能夠享受閱讀的樂趣。

¹³ 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頁160-166。

¹⁴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352-272。

中譯者序

20 世紀70年代初期，海外學界開始注重研究社會下層，這一社會史領域的研究轉向，誘發出20世紀後期國內盛極一時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研究熱潮，中等社會研究、下層社會研究蔚成時尚。不過，大量論著的背後意識或許受到市民社會這一西方理論產物的牽制，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套用西方時髦理論框架的趨向，真正由本土歷史事實產生「本土理論」的論著似乎並不多見。然而，就在國內趨洋之風盛行之時，美國學者中卻出現了對中國歷史進行「本土化研究」的可喜趨向，《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一書恰為經典性的代表論著。

該書以北京寺廟和民間宗教活動為中心，全方位論述明清以來北京的宗教場所及社群活動。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北京宗教設施的運作情況及其作為公共空間的廣泛用途；第二部分描述明代京城寺廟與城市政治文化在空間上的聯繫，由宗教視角展現京城的城市生活和社會組織活動；第三部分討論清代至民初寺廟及宗教性活動在京城變遷中發揮的諸多作用。

作者認為，宗教場所、社會組織以及宗教性活動對創造京城特有的皇城文化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對於研究宮廷生活與城市生活，皇族與群眾之間的聯繫，甚至於研究普通百姓生活方面簡直無可替代，是研究皇族活動與平民生活的理想場所，即便是用於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它仍然是一個不可棄置的窗口。作者強調民間宗教有很強的思想感染功能，屬於國家正統理念以外民間信仰的重要源泉。除了思想感染功能，寺廟的經濟功能也不能忽視，以寺廟為中心的集市廟會和進香活動，豐富了商品交換與地方經濟的發展。從明清至民初，國家的「去宗教化」走向最終減弱了寺廟在平民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寺廟充當了超乎國家控制的一個民間場所。

作為一部兼跨城市史、宗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領域的典範性著作，該書的主要成功之處在於：

其一，成功展示了宗教與城市社會生活的融合，將讀者引進了一個很少有機會接觸的世界。以往對中國宗教的研究，多側重宗教教派、重要思想家以及修行生活，對於宗教思想和行為如何融入世俗社會，尤其是對社會成員不同習俗和信仰的大眾宗教研究比較薄弱。本書通過敘述北京的寺廟、神及神職人員、皇室及一般民眾對寺廟的捐贈及在寺廟裏進行的節日慶典、朝聖、休閒、社交、非正式政治集會和旅遊等活動，向讀者展示了普通人與信眾在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宗教領域的融合，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對宗教整合功能，特別是寺廟和大眾宗教在京城社會發展過程中重要性的理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其二，成功地提供了從宗教視角描述城市社會組織側面的範例。怎樣分析一個城市內部的社會及經濟力量，如何考察城市事務管理及社會團體的形成和發展，是學界非常熱衷的問題。韓氏論著以寺廟為切入口，著重描述了行會、會館、宗教團體的歷史，講述關於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紀念及被紀念的觀念，探討地方精英、宦官和神職人員利用寺廟的表面儀式和私人欲望，介紹那些基於祭祀而形成的習俗。這些努力，成功地展示了世俗社團的活動場景和組織模式，使我們理解了明清時期教派組織有可能演變為對立性社團甚至是起義工具的潛力。相對於中國社會宗族和朝廷來說，宗教生活的研究相對較弱，該書從寺廟角度切入，描述明清京城社會歷史，既體現出新視角的優勢，也強化了我們對中國宗族和朝廷組織的認識。

其三，該書豐滿了明清以至民初時期京城的歷史形象，使我們對帝王之城既感到熟悉卻又與眾不同。以往的研究過於強調帝王生活，鮮少涉及北京的宗教社會和一般民眾。本書作者從宗教和寺廟角度切入，描述明清兩朝皇室、宦官、旗人的宗教生活，對寺廟環境中的家族、行會和會館社團以及穆斯林等社群的活動進行了深度掃描，尤其是對晚清「現代性」背景下基於寺廟的購物、閱讀、社交等各種公眾活動的俯瞰，使讀者不由自主地置身於京城的宗教和人文世界，驀然發現了北京作為帝王之城以外又一個鮮活的側面。

韓書瑞教授從七十年代開始致力於清代民間宗教的研究，出版有《山東叛亂：1774 年的王倫起義》、《中國的千禧年叛亂：1813 年八卦教起義》、《北京妙峰山的進香》等十多種論著，她對清代民間宗教和社會問題的詮釋歷來得

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寺廟》一書作為其進一步探索宗教與社會關係的力作，取得了上述多方面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書中似亦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之處。

首先，該書在「公共領域」研究趨盛背景下，刻意尋找家族和朝廷結構之外的社會組織，選擇以寺廟為切入口，通過寺廟周圍的社團來觀察北京城市生活歷史，顯然會有難以解釋的實際問題。諸如，各類宗教與儒教文化在民眾生活中的真實地位如何？寺廟與朝廷在現實中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宗教對社群的整合能力是否超越了本土的文化聚合潛力？

其次，作者從宗教視角重構北京城市社會生活，在研究中使用大量的碑文和私人撰述等材料。這類文獻其實只是特定人群選擇性記憶保留下來的遺存，在利用這些材料時如何對這些材料進行傾向性別？如何區分「敘述文本想像的真實性」與「確實史跡存在的真實性」？

再次，作者雖然以寺廟為中心探討了皇室、宦官、地方官員、旗人、職業群體等社群的宗教生活空間，但其研究的微觀層次尚未關注到具體一家一戶的普通平民的宗教信仰，這對於我們全面認識大眾宗教對城市社會生活的整合是否也有些不完滿的缺憾？

考慮到韓書瑞一書體大精深和該書是在當時公共領域討論背景下對城市組織展開研究的城市研究的範例，其研究中尚存一些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正常的。因而，這些不足，並不妨礙其為宗教史和城市史研究方面非常優秀的一部著作。

——朱修春：《在寺廟故事與城市生活之間》刊於《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4期。

序 言

十幾年前開始做這項研究時，我就思考著把我對中國民間宗教的興趣及對華北地區教派傳統的熟悉轉向研究更普通的信仰及活動上去。當我確定研究北京的寺廟這個論題時，我對自己將會發現什麼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當時完全不清楚這項任務的規模有多大。中國國內的研究往往是對原始資料的加工和整理，缺乏綜合性的敘述。這種研究方式是近期較多論著形成的基礎，而且研究中對北京過去帝制的強調是以犧牲北京地方社會歷史為代價的。結果，沒有一種語言準確描述了北京的社會、經濟、政治或文化的歷史。¹直到最近，選題偏窄的中國論著慢慢多起來，由細流變成了一股強流。²

英文的讀者會發現成果仍然相當少。有關 1900 年以前的北京歷史，有幾篇沒發表的專題研究，James Geiss(1979)、Alison Dray-Novey(1981)及 Joanna Wakeland(1982)的博士論文值得關注。對於 20 世紀的北京，David Strand 關於 1920 年代的政治及北京生活的著作為我們的研究樹立了一個典範，而 Mingzheng Shi、Madeleine Yue Dong、Richard Belsky 及 Sophia Lee 的近期論文，以及其他學者的一些正在進行的研究，都正在填補著這個領域的空缺。

有關中國其他城市的學術研究發展情況較好一些，但罕有涉及社會或宗教歷史的。Arthur Wright及F. W. Mote開創了英文世界對中國帝國都城史的研究。二十年前，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了一個在城市網路中比較城市及城市地位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頗有影響。然而，日本城市除外，大部分在 1800 年

¹ 參看侯仁之第七章或閻崇年。近期著作開始補救這種情況。1994 年出版的一套十卷的《北京通史》在研究方法上很傳統。吳建雍等所著的《北京城市生活史》於 1997 年末出版，書中有關明清的章節更好。我的研究基本上用了同種來源資料，但看到這些著作時我的研究已完成了，因此我沒有參考它們。

² 仍然集中於幾個論題：市場、貿易、節慶、宮殿、景點。參看《北京史苑》1-3；孫建；還有侯仁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邱仲麟（77—90 頁）調查了明代的寺廟建築。

以前發展程度超過同期歐洲城市的中國城市仍然未被研究。幸運的是，羅威廉（William Rowe）關於早期現代化城市漢口的兩本書，顯示了如何大規模地分析構成一個城市的社會及經濟力量，如何考察城市事務的管理，如何勾勒出十八、十九世紀城市社團的發展。其他許多語種對臺灣的鹿港、中國中部的揚州、蘇州、上海的研究，以及對北部的濟南和天津的研究，都為解讀前近代中國城市奠定了基礎。³近來蓬勃發展的關於 20 世紀城市生活的研究頗受歡迎，但是對 20 世紀之前的時代卻仍然沒有給予相當的關注。⁴

雖然歐洲、日本以及北美的歷史學家們已經提供了有用的方法、有趣的觀點以及對許多城市中心的豐富描述，但是，我們對倫敦、巴黎、紐約和東京的瞭解卻恰恰暴露出：有關中國城市的原始資料和二手文獻都是相對匱乏、零碎的。雖然希望此書能提供新的關於比較城市發展的跨文化理論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失望，但是我希望本書至少能將北京納入到具有悠久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城市中來，並盡量讓廣大讀者易於理解。⁵

我的研究從 15 世紀早期明朝第三代皇帝重建北京開始，到 1900 年外國侵佔結束。因為在這五百年中北京為帝國的都城，學者們既有的研究加深了帝國歷史對北京城市歷史的湮沒。王朝帝都當然是北京的重要部分，但是它只是一部分。此書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探討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讓我們從更好的視角認識皇城北京。不同領域的相互影響、競爭和滲透都將在我們的故事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我不會宣稱北京和其他任何城市一樣，但是對其非帝國面相的更多關注將會顯示出北京與其他大都市更多共有的特點。

³ 揚州：Finnane 1985, 1993。蘇州：L. Johnson 1986; Marmel 1987, 1993; Santangel; Tsao。上海：L. Johnson 1995。鹿港：DeGlopper。濟南：Buck。天津：Hershatter; Kwan; Rogaski 1996。綜合性研究：Skinner 1997; Motel 1995。

⁴ 對這些文獻（如 1996 年的）的完整討論，參看Henriot和Yeh主編的書中Christian Henriot和Limin Zhang的論文；對上海以外的研究，參看Esherick 2000。兩份報告近期研究的期刊：《城市史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及《華爾街和市場：中國城市歷史新聞》（肯塔基大學）。

⁵ 請自由使用我的資料來提出你自己的理論。我只希望這裏描述的過程能應用於其他一些類似的情形，在某種適度複雜程度上有說服力。